



引言

冬至的晚上，我接到了一位啓思的編委同學的電話，約我寫一篇有關「醫學生如何看九七」專題的稿。筆者對「九七問題」沒有什麼獨特的分析，寫了出來也恐怕是陳腔濫調，更遺憾的是自己很少以一個醫學生的角度看「九七問題」。但筆者可算是啓思的「老鬼」，同學的約稿總是不好意思推辭的。以下是筆者這兩年多來參與關注「香港前途」活動的一些感受和一些不很成熟的看法，希望和大家分享一下。

歷史的見證人

人民大會堂的西大廳裏，百多名中外記者已等候了多時。應中、英雙方邀請參觀「聯合聲明」簽署儀式的香港各界人士首先到達會場。數分鐘後，中、英雙方的談判代表團、中方外長吳學謙、英方外相賀維、中國國家主席李先念和鄧小平等先後到達會場。最後進來的是代表雙方簽署的趙紫陽和戴卓爾夫人。會場內各人的心情既緊張又舒暢，緊張的是我們將面臨一個歷史性的時刻，舒暢的是困擾了中、英雙方和香港兩年多的「九七問題」終於得到解決。

簽署儀式終於開始了，在百多支閃光燈此起彼落地亮過後，雙方代表在「聲明」上簽字和交換了聲明文本，而整個儀式只花了約十五分鐘，最後是戴卓爾夫人和趙紫陽分別發言和祝酒。

在這十五分鐘的背後，中、英雙方經歷了兩年來廿二輪的談判，港人也經歷了無數的困擾和衝擊。香港的學界在關注「香港前途」方面亦擔當了一定的角色。生活在歷史轉捩期的香港人都是這頁歷史的見證人，而我們這一代的年青人將見證着香港主權的移交、「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的成果。我們將是這個成果的承受者，將來也要接受歷史公正的評價。現在就讓我們重溫一下這兩年來學界的一些事件吧！

歷史的回顧

一九八二年九月廿七日，中大和理工的學生代表高舉「反對不平等條約」等標語到機場「迎接」剛訪華後的戴卓爾夫人，「機場事件」相信是學界公開參與香港前途問題的序幕了！將來的歷史肯定會對這件事作出合理的評價。那時候的醫學會正受着「血書」事件的困擾，同學們正埋頭於「中央與單位關係」等問題，忽略了外面的形勢。

醫學會最早關注「九七問題」的活動要算是八一年底的一次研討會，當時整個陳蕉琴樓都坐滿了聽眾，而聽眾當中還有一些攝影師呢！相信近期的同類活動不會有當日的場面。可惜自此以後有關「前途」的推廣工作一直沉寂下去，而當時的外務小組是默默地研究「九七問題」，啓思也曾刊登過一兩篇有關的文章。

英相訪華後，醫學會的第一次「九七」活動要算是一個有關「港人治港」的講座，當時的時事組也打算就「港人治港」和香港政制方面研究，這一點醫學會可算是趕上關心香港前途的活動，其後由於社會事件，關注香港前途活動始終是停留在原有的基礎。

學聯在八二年二月的周年大會制訂了「民主」和「民族」兩個大原則來面對「九七問題」，其後學聯回訪中華全國學聯代表團於七月會見港澳辦公室的負責人後發表了有關解決香港前途的十點聲明，而這十點方案基本上鈎畫了日後「聯合聲明」的原則。這段期間，港大學生會評議會也發表了「意見書」，提出了「港人民主治港」的概念，當時學生會曾發表意見，「意見書」可以算是港大學生會的第一份公開立場。

相信大家不會忘記了「戴函事件」，一千四百多人的全民大會在學生生活會的歷史上是空前的。當時圍繞着的問題焦點是客觀效果是否「親共」、程序是否合法和「代表性」等問題，「戴函」終於是收回了。但是在全民大會上對「戴函」的觀點是肯定的，相信這是當時學生會幹事不辭職的原因。值得一提的是九〇五位港大同學聯署了一封回覆戴卓爾夫人覆函的信件，內容論述了香港政制的民主化和兩局的代表性等問題，而「九〇五信件」相信是創下了港大學生聯署的記錄。

踏入了八四年初，學界關注香港前途的活動跌至了一個新的低點，同學在這段期間不斷反省了學生會的角色和代表性等問題，這段期間發生過的事件有兩大學生會分別致函給趙紫陽和港大學生會的「前途宣言」。

八四年五月，英外相訪華後，學聯委派了港大的馮煒光同學（當時的港大學生會會長）參加「民主促進團」往倫敦。「民主促進團」是由幾位關心香港政制民主化的個人和團體代表組成的，他們到倫敦的目的是游說英國國會加速香港政制開放的步伐，這次相信是第一次學生到英國反映有關香港前途的意見。英外相訪華後給人一種「塵埃落定」的感覺，香港的主、治權是解決了，剩下來而又是最重要的是政制民主化的問題，「兩局」議員在這時候才公開出來「為民請命」呢！

八四年中，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代議政制」綠皮書和一份大家都預料得到而又不可修改的「聯合聲明」，期間也有一些研究「基本法」的草擬。談判在不知多少次「有益、有建設性」後結束。九月廿六日中、英草簽了「聯合聲明」，民意審核處是一場活劇。「聲明」終於在十二月十九日正式簽署了。

以上的回顧是筆者一些印象比較深的事件，其間有一些事件例如「香港周」和「民間會議」等由於篇幅所限不能詳細論述，而這個簡短的回顧也不是全面的，筆者只是想從這兩年的一些歷史當中總結一點經驗。

歷史的經驗

這兩年來很多人在前途問題的衝擊下左搖右擺，有人看風駛悞，有人不斷「覺悟前非」，筆者不是想翻歷史的舊賬，而是比較欣慰的是學界相對之下始終是堅持「民主」和「民族」兩項大原則，「機場事件」曾經給人扣上了「親共」和盲目「民族主義」的帽子，但是當時有誰會想到兩年後比學界「親共」和「民族主義」的人還多呢！

學生雖然有大原則，但是他但欠缺了深入的分析和延續性。我們從回顧的部份可以看到，學生的觸覺是敏銳的，但是他們很多時受着社會氣氛的影響以致他們不能作精密和長遠的部署。試想想「戴函」事件要是

遲幾個月發生，情況可能完全改觀，因為那時中、英雙方已經「同聲同氣」，已不存在着什麼「親中」或「親英」的問題。如果在八一年底便開始有計劃、有組織地研究前途問題，學界肯定會是這方面的「專家」。筆者不是想在這裏放「馬後炮」，而是希望學生會的「搞手」們能夠看得「細」些和看得「遠」些，但是這方面常被學生組織每年「轉庄」的特點影響了，這是學生組織的弱點。

前瞻

在一片「聯合聲明好到極」的歡呼聲中，我們要知道日後的道路還是很遠呢！擺在我們眼前的就是基本法如何草擬？香港的政制往那個方向發展。在一個日益政治化的社會裏，從前一個不問政治的醫生也要開始面對明年「功能團體」選舉立法局議席的問題。從小就缺乏政治教育的我們這一代醫學生怎樣面對日後更加政治化的社會呢？

這兩年來，香港人受着不少的衝擊，很多人開始認識到「地球不是圍繞着香港轉的」，他們漸漸從「大香港主義」的美夢中醒過來。香港最終要成為中國的一部分，中國的前途影響着香港的前途，中國的民主化才是香港「自由和民主」的最終保證。「五十年不變」是一種苟安的心態，香港這兩年來就不是變了很多嗎？我們要開始從中國的全局出發去分析香港的問題，事物總是不斷地變化的，我希望能夠看到中國和香港向着好的方面變。